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第十二卷 2

非外借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第 1 卷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第十二卷·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第十二卷. 2/胡星亮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305-19763-5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793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十二卷·2)
主 编 胡星亮
责任编辑 卢文婷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16 印张 14.5 字数 300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763-5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 健

副 主 任 丁 帆 温儒敏 陈思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帆 王 尧 王中忱 王爱松 王彬彬

王富仁 朱晓进 刘 俊 杨 义 何锡章

陈平原 陈思和 吴 俊 张光芒 赵宪章

胡星亮 董 健 温儒敏

主 编 胡星亮

执行主编 张光芒

副 主 编 刘 俊 王爱松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编辑部

通讯地址：南京市仙林大道 163 号(邮编 210023)

南京大学文学院 638 信箱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电 话：(025)89686720 89684444

传 真：(025)89686720

E-mail: zgxdwxc@163.com

目 录

【“五四”文学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专稿】

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所表现出的儒帅风范

——纪念新文学运动百周年有所思 朱德发/1

【作家讲演录】

出发之地 张 炜/15

【现代论坛】

中国乡土小说叙事传统的承续与变异 李兴阳/23

论海派文学中的音乐书写 刘永丽/35

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余爱春/45

无法被规训的激情

——太阳社期刊《拓荒者》及其美学异质 范云晶/55

中国故事,如何讲述

——论鲁迅小说的故事性 张文诺/65

论《围城》的分裂与补救 程小强/76

【现代文学与英语写作】

幽默与“人类之爱”:叶君健外语小说的格调 倪婷婷/85

语词之失与现实之累:奥登《战时组诗》读札

——以《中国兵》的修改为线索 李倩冉/96

【文学史透视】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艺术策略与体制突围

- 以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为例 刘家思/111
- 日军手记与抗战文学 赵 伟/123
- 1980年代与新启蒙散文 周红莉/131
- 文学史观建构的限制与突破
- 从中国内地考察后“九七”时代香港文学史的编撰 徐诗颖/145

【文学现场】

- 论1990年代以来乡村“土改”小说的叙事策略 张羽华/157
- 论新时期“干校叙述”的两副面孔 王冬梅/166
- 精英与民间的话语碰撞
- 试论莫言小说的语言风格之争 陈黎明/176
- 《无字》的反思境界
- 从一个被忽略了的重要争论说起 罗 艳/187
- 被形塑的无知者和被改造的闯入者
- 论王安忆的《月色撩人》 季 奕/197

【当代文化与戏剧研究】

- 湖北戏曲形态的当代转型及其主要问题 陈爱国/207
- 中介化的在线修行:角色、时空及文化镶嵌 朱丽丽 蔡竺言/216

CONTENTS

Hu Shi's Style of A Confucian Marshal in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In Memorial of the 100 th Anniversary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Zhu Defa / 1
The Place of Departure	Zhang Wei / 15
The Succession and Variations of Narrative Tradition in Chinese Local Novels	Li Xingyang / 23
On the Music Value System in 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	Liu Yongli / 35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Canonization" of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Publication of Kaiming Bookstore in Guilin	She Aichun / 45
The Enthusiasm that Cannot Be Disciplined; <i>The Pioneers</i> and Its Aesthetic Heterogeneity	Fan Yunjing / 55
How to Narrate the Chinese Story; On the Story Nature of Luxun's Novels	Zhang Wennuo / 65
On the Separations and Remediations of <i>Fortress Besieged</i>	Cheng Xiaoqiang / 76
Humor and "Human Love": The Style of Ye Junjian's Foreign Language Novels	Ni Tingting / 85
The Words Lost and the Reality of Auden; The Reading Notes of <i>War Poems</i>	Li Qianran / 96
Artistic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Breakthroughs of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ry Creation;	Liu Jiasi / 111

The Japanese Army's Notes and the Literature of Anti-Japanese War	Zhao Wei / 123
1980s and The New Enlightenment Prose	Zhou Hongli / 131
Restrict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Conception; On the Compilction of HongKong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Post'97 Era	Xu Shiying / 145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he Rural "Land Reform" Novels Since 1990s	Zhang Yuhua / 157
On the Two Faces of the "Narration of Cadre School" in the New Period	Wang Dongmei / 166
The Discourse Collision Between the Elite and the Folk; On the Controversy of Moyan's Linguistic Style	Chen Liming / 176
The Realm of Reflection About the Novel <i>No Word</i>	Luo Yan / 187
A Shaped Ignorant and Reformed Intruder; On The <i>Moonstruck</i> of Wang Anyi	Ji Yi / 197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Hubei Opera Form and Its Main Problems	Chen Aiguo / 207
Online Religious Practice of Mediation; Characters, Space, Time and Cultural Inlay	Zhu Lili, Cai Zhuyan / 216

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所表现出的儒师风范

——纪念新文学运动百周年有所思

朱德发*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内容摘要:胡适与陈独秀皆为“五四”文学革命“统帅”,同陈独秀、钱玄同急进刚烈的风格相比,胡适表现出温和谦让、仁义勇智的儒师风范;特别在对待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强烈反对者林纾、章士钊的态度上,表现出以德报怨、宅心仁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胡适这种儒师风范的形成,与其能理性地敬孔崇儒密切相关。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胡适;儒师;风范

若在 1917—1921 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考察“五四”文学革命的统帅者是谁,那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都会从心里认定胡适、陈独秀二贤乃当之无愧;但是在近百年特别是 1949 年以来的大陆学术界,却一度将胡适妖魔化。通过“拨乱反正”,至今方使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的真实面目,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如果承认胡适与陈独秀皆是文学革命的统帅,那么胡适究竟是什么风范的统帅?且不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①这一判断,能否经住历史的检验;仅就胡适在阶级论的研究框架里来看,他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其所言所行无不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和动摇性。而这种先天性的不足,则无疑说明胡适不仅不能充当“五四”文学革命的统帅,而且必然要成为其对立面。虽然“拨乱反正”以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论分析方法,对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身份地位、所作所为也不进行阶级定性分析或政治判断;但是将胡适纳入现代文化或现代文学视野重新评述重新判断以来,即使恢复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统帅地位,也没有对其所谓的软弱性、妥协性甚至投降性予以纠偏和匡正,给出新的解释或新的判

* 作者简介: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第 3 页。

断。在我看来,只有把胡适置于儒家学术视野,对其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所言所行予以探幽发微的考察,方可窥见他的仁义勇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大度雅量的儒帅之风,以及为国效力、敢担大任的家国情怀;若说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激进果决、以刚克刚、勇往猛进的“武”帅,那胡适则是温和敦厚、以柔克刚、稳打稳扎的“文”帅。正是胡、陈二人这种相反相成而又互促互补的统帅性格所形成的巨大张力,驱动着文学革命遵循既定方向前行。

—

“五四”文学革命酝酿期的1915年至1916年,胡适在美国留学,通过书信与国内策动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相互联系;文学革命的动议与设计主要是由胡适在美国完成的。1915年夏天,胡适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了较系统解读与深入研究,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迪与参照下,他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然而他的文字观却引起同在美国绮色佳过夏的学友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唐肇黄的激烈争论,从中国文字问题转移到中国文学的问题,较守旧的梅光迪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经过激烈的争论,胡适形成了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文学革命”方可解决“神州文学久枯馁”的坚定信念。历史的重大转折及其推动历史转折的英雄人物与决策方案的出现,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却常常透过偶然事件彰显出来。

如果承认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活文学取代死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和语言史继往开来的重大转变,那就应该格外重视围绕胡适策划“文学革命”而发生在美国的两个偶然事件的历史细节:一是1915年9月17日胡适作了一首长诗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学深造而激起的风波。此诗第一次用了“文学革命”一词,全诗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于是引起一场风波;任叔永作了一首游戏诗,挖苦胡适的“文学革命”是口出狂言,而胡适则在由绮色佳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火车上,用任叔永游戏诗的韵脚作了首答诗,即提出“诗国革命”问题,又拟订一个“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方案。但是他们学友之间的笔墨官司并未因各居一方而停战,而是偶一接触便爆发。到了1916年,围绕“文学革命”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而争辩的焦点仍是胡适的“要须作诗如作文”一句诗。梅光迪来函驳斥胡适,任叔永来信赞成梅光迪的主张;胡适感到孤立无援,但仍毅然坚持“文之文字”能“入诗”的主张。通过这场越演越烈的争辩风波,促使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①“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况且,“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①。是年3月胡适写信给梅光迪,略说自己的“新觉悟”,梅回信竟然很赞成胡的见解,胡高兴地认为梅也成了“我辈”;遂后胡适便把“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写出来,并作了一首《沁园春·誓诗》,表达“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雄心壮志。

^① 胡适:《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二是1916年7月8日任叔永同陈衡哲、梅觐庄、杨杏佛、唐肇黄游凯约嘉湖遇雨船翻，任叔永便作长诗《泛湖即事》寄给在纽约的胡适，由此“引起了一场大笔战”。因为在长诗中任叔永用了不少“言”字，恰好针对胡适《诗三百篇中“言”字解》一文，胡有点不舒服，就写信给叔永；叔永见信不服，又回信给胡；不料竟引了梅觐庄出来打抱不平，写信斥责胡适。而胡适以开开玩笑的态度写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回答梅觐庄。梅、任两位大不以为然。梅来信大骂胡适，叔永也写信表示不满。后来，胡适回忆起这场笔战引起的文坛大风波，深有所悟地认为：“这一首游戏的白话诗，本身虽没有多大价值，在我个人作白话诗的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为梅、任诸君的批评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试作白话诗了。”^①胡适不只积极主动地尝试写作白话诗，而且把文学革命的“许多散漫的思想汇集起来，成为一系统”，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提出八个文学革命的条件，不久写成《文学改良刍议》。

上述两次笔战风波，仅仅是发生在“五四”文学革命酝酿期的偶然事件，也算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小细节；然而这两个偶然事件或历史小细节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虽然历史是既成事实不能假设，但是有时必要的假设能深化对历史的认识。试想，假设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漠不关心或者毫不熟悉，并没有发生两次笔战风波，哪能逐渐形成文学革命的具体方案？哪能涌现出“且准备搴旗作健儿”的文学革命先锋？哪怕陈独秀在国内以《新青年》为阵地撬动起新文化运动已为文学革命兴起做好了“万事俱备”，但若没有胡适们在域外煽起的“东风”送到国内，那文学革命的发动也不知要推迟到哪年哪月。这说明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推动着历史上的必然事件来到，偶然的成功也能预示着必然的成功。尤其值得重新认识和称赞，透过这两次笔战风波所提供的历史细节，可初步窥见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策动者所具有的儒将或儒帅的风范：他不仅当仁不让地为文学革命“搴旗作健儿”，而且要以儒家所提倡的家园情怀为内在动力，“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他不仅在“文学革命”的论战中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表现出“君子坦荡荡”的宽容雅量胸怀，而且在激烈的笔战中从不骂人撒野，表现了虚怀若谷、严己宽人的儒雅之风；对于文学革命方案的设计，彰显了胡适“业精于勤”的博古通今的知识结构和为大多数人作白话文学的“泛爱众”的人道主义情感；毅然决然地独自尝试写作白话诗，表现出胡适“言必行，行必果”的勇智作风。

《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紧跟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吹响了“五四”文学革命进军的号角。陈说：“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从此，胡适与陈独秀并肩作战，成了“五四”文学革命名副其实的统帅；胡、陈二帅在文学革命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风范始终为新文学批评者或文学史书写者所关注，给出差异互见的评述，尤其体现在对这两段话的理解与判断上。

^① 胡适：《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胡适在1917年4月9日写给陈独秀的长信中说——

此事(指文学革命,笔者注)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号)上答胡适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因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摒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①

上述两段话,一是出自策动“五四”文学革命的胡适之口,一是出自声援“五四”文学革命的陈独秀之口。在近百年“五四”新文学运动评论与研究中,大都认为胡适对待文学革命的态度软绵绵的,缺乏革命家应有的坚定性,难免有妥协性、退让性乃至软弱性之嫌;而陈独秀乃是立场坚定不移、态度斩钉截铁、言语霸气十足的文学革命家,难怪有些著述只认陈独秀为文学革命之统帅,就连胡适也承认陈氏对待文学革命持有“武断的态度,其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②。

处于当下的文化语境,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胡、陈这两段话,也许会有新的体认。胡适当时作为文学革命的统帅并未亲临现场,而是在美国遥控指挥,况且他对“文学革命”方案所经历的口伐笔战又有深切体验,并认识到文学革命已由方案变为运动,已从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转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因此胡适对文学革命采取“温和谦让”的儒家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既有利于文学革命主张的传播和接受,又有利于通过讨论在国内的文人学者中形成共识。由于文学革命毕竟不同于政治革命,即不是以暴力行动推翻旧政权而建立新政权,它的主攻方向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活文学替代死文学。从特定意义来说,文学革命仍属于学术研讨或学术论争的认识范畴,陈独秀也承认“容纳异议,自由讨论”乃“学术发达之原则”。特别是文学革命牵动着中国数亿人的语言习惯、思维定式乃至审美习惯的大调整、大变换;而数亿人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则是最顽固最可怕的势力,仅靠舆论上的“白话为正宗之说”而“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武断霸权,是难以撼动几亿人所形成的语言、思维和审美习惯的。况且,“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陈几个人先闹起来的,并没有政府的力量或政权的势力作为坚强的后盾,只

^① 胡适:《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1-132页。

^② 胡适:《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靠民间力量来支撑,不能用“专制的手段来实行文学改良”,只有“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①。总之,种种理由可以证明胡适对文学革命所持的谦逊态度和忍让策略,并非软弱无能、妥协气馁,更不是犯了所谓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软骨病”,而是在文学革命的实践中显露出儒帅之风,这种儒帅之风与陈独秀斩钉截铁的帅气,形成相反相成的互补力量,驱动着文学革命的具体方案成功落实。

若说胡适回国前对自己提出的“文学革命”方案容人讨论的策略尚存疑虑,而认同赞成“老革命党”陈独秀绝不容人讨论的“武断口气”的话;那么回国后胡适亲自考察了《文学改良刍议》一年多的讨论实况,越发坚信求同存异的“容人讨论”的策略是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这从胡适《答汪懋祖》的信中可以查证。汪给胡适的信反映《新青年》讨论情况:一是“两党讨论是非,各有其所持之理由。不务以真理争胜,而徒相目以妖,则是滔滔者妖满国中也”;二是本报“如村姬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针对此情状,胡适是这样作答的:

那时独秀先生答书说文学革命一事,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有异议。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了。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指《新青年》)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②

这足以表明胡适在文学革命中所坚持的政策或策略是宽容仁义的,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儒学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学术的民主精神,这越发彰显出胡适的儒帅之风。

钱玄同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是与胡适、陈独秀二帅并肩战斗的闯将,虽然他称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义精美,但其在对待文学革命的态度或策略上近似陈独秀,显得激烈决绝,这主要体现在如下的通信中。

1919年2月《胡适致钱玄同》一信,同年同月《钱玄同致胡适》一信,接着《胡适致钱玄同》又一信。在这三封信的相互比照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两位文学革命先驱的思想风貌和性格胸襟的差异。宋春舫曾在《公言报》上发表谈戏剧改良的文章,钱玄同“丑诋宋春舫之戏谈”。胡适便致信钱玄同:“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无益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

① 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② 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6-77页。

得是一个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繆子(张厚载),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认为这个人也受了多作日报文字和少年得志的流毒,故我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而钱玄同致胡适的信则是这样作答的:“我对于宋春舫,原没有什么恶感;不过先头听了你和蔡先生如此的恭维他,而亲见其人,却是‘碌碌’得很,因此不免把尊敬他的心理消灭许多罢了。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讯,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的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对此胡适又致信钱玄同,给出这样回答:“至于老兄说我‘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我用不着替自己辩护。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即“正当的‘立异’皆所以‘求同’。”^①

从两人的通信里,可以看出钱玄同口快心直、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对于《新青年》及文学革命坚定的捍卫,即使新派人物也要严格以待,不能迁就,更不能袒护;对于腐臭的旧社会深恶痛绝,哪怕破口大骂也不在意。实践证明,“五四”文学革命的革故更新需要先驱们这种充满爆破力的性格;但是历史教训也告诉我们,这种性格给文学革命造成的遗憾至今仍值得反思。胡适不愧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统帅,对于一些拥戴文学革命的新派人物,哪怕其有缺陷、不成熟,也要佑护,也要挽救,更要引导教育,以扩大“文学革命军”的队伍,巩固《新青年》阵地。这充分表现了胡适宅心仁厚的人道主义胸怀和铁肩担道义的勇于负责精神。对于自我在文学革命大讨论大论战中所遭到的辱骂、攻击甚至污蔑、恐吓,胡适并未计较个人之恩怨得失,乃是坚守“小不忍而乱大谋”的儒学信条,从容不迫、积极乐观地对付内忧外困,只要文学革命的“大谋”能够实现,“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②。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和那些腐臭的人,胡适同其周旋,以笔者之见,这种“周旋”既不是胡适的划不清界限,也不是妥协投降,而是软磨硬抗,以柔克刚;也可以说他要重新估价一切的科学精神重新认识老祖宗在旧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以活语言营造活文学所形成的几千年白话文学传统,就是通过反复“周旋”而被胡适所发现,并在“五四”文学革命后传承下来。“周旋”的结果不只是分清了旧中国文化和文学上的“国粹”与“国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4-27页。

②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第6卷第1号。

渣”，而且也分化了“那些腐臭的人”，使其可挽救者进入新文化与新文学阵营。至于对“五四”文学革命主张，胡适是坚持“立异”“求同”的策略，这与儒学的“和而不同”哲学原则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胡适所有的文学主张都是标新立异的，而他并不在意其主张的“立异”高不高，而重视如何“实行这主张”。只要通过尝试或实验致使其文学主张转化为实践，此效果就能证明其文学主张的“立异”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能使更多的人认同“我的‘异’”，文学革命的目标实现了，“我的‘立异’的目的”也达到了。于是最终完成了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之“天降大任”。

二

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儒师风范，乃是他复杂人格或思想气质中原有的因素。过去的胡适研究大多从机械阶级论或现代人性论或现代性的视角，来窥测、剖析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言行，而罕见从儒学视野切入。一旦从儒学角度审视胡适，便可发现他的儒师风范体现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最突出的体现也许是在对待保守派或国粹派的态度与策略上。保守派中反对新文化、抵制文学革命最厉害、最拼力的，莫过林纾；直接攻击并诋毁胡适及其白话文主张的，也是林纾最激烈。然而胡适对林纾却采取以德报怨的态度，大显儒帅之风。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激烈攻击的。”^①鲁迅道出了当时的实情，而在这“各方面激烈攻击”中，林纾正是打头阵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1月刚发表，林纾就在是年2月8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反对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维护古文的正宗地位。林对白话文学的思想内容并不关心，只是强调文言不当废。人在历史潮流的驱动下有时向何方行，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林纾应算是近代的著名文学家，曾受过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洗礼，既鼓吹过进步的小说理论，又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并目睹晚清“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②的景况；若从历史联系上来说，林纾若顺势而为应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又是无情的，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的确确扮演了一个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厉害角色。如果仅就《论古文之不宜废》、《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这两篇文章来说，虽具有反对白话捍卫文言的鲜明立场，但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如后文在平心静气地辨析古文与白文相互消长的关系时，只是强调“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因为“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抵，无古文安有白话”。尽管林纾的白话观与文学革命主帅胡适的白话文学观相左相抵，但林之所言也有一定的道理。林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② 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印刷图书公司1935年，第79页。

纾还发表过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及给蔡元培校长的信《致蔡鹤脚书》，攻击新文化革命。

面对林纾的咒骂和攻击，胡适没有采取睚眦必报的敌对态度和你死我活的攻击手段；而是持有大丈夫敢作敢为、能伸能屈、理直气壮的心态和公平正义、以德报怨的气度，对林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文学史和翻译史上的地位、贡献和得失，仍然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例如，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是这样评价林纾的：“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作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斯的作品。”“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这实在不是林纾一班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即使对于林纾诋毁诽谤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适也没有发狠动怒，而是做了平实的叙述和理性的分析：“当时古文家林纾在《申报》上作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内中有一篇《妖梦》，用元绪影北大校长蔡元培，陈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那篇小说太齷齪了，我们不愿意引他。”连同《荆生》的影射及“伟丈夫”凶相的出现，足能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①。哪怕林纾最后惨败了，白话文学运动高奏凯歌，胡适也没有嘲弄他，仍以宽宏雅量的史笔给予相当的赞许，并未因其诋毁否定新文化运动而贬损林纾。

林纾1924年辞世后胡适特为其写的《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②一文。林纾去世时，北京有几家报纸引述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文学》里的话为其盖棺定论，胡适认为：“这真是林先生生前梦想不到的事。”“现在我要做的一件事，更是林先生梦想不到的。我要发表林琴南先生三十前做的白话诗。二十八年（光緒丁酉，1897）正当维新运动将成立的时期，国中的知识阶级受了种种外患的刺激，大家都期望做一番改革的事业。富国，强兵，兴学堂，开风气，开通民智，废八股，废缠脚……的喊声，到处都听得见。在通商口岸，这种声音更是热闹。当日确有一班新人物，苦口苦心地做改革的运动。林琴南先生便是这班新人物里的一个。那时候，林琴南先生受了新潮流的影响，做了几十首新乐府，批评种种社会制度的不良，发表他的革新意见。这些诗都可算是当日的白话诗。当时曾印了一千部行世，原名为《闽中新乐府》。”现在此书很难找到，多亏高梦旦从破纸堆里捡得此书并选抄一部分寄给胡适，说可为“五十年文学史的材料”。胡适认同高梦旦的见解：“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作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所以我把这些诗选了几首，托《晨报》纪念号发表出来。”所选的诗有《林先生 讥蒙养失

① 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② 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1924年12月1日《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